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主 编 吴晓明

副主编 邹诗鹏（常务） 王金林

祁
涛
——
著

返回的步伐：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

THE STEP BACKWARDS

Methods and Landscape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返回的步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祁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11
(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吴晓明主编)
ISBN 978-7-309-15365-1

I. ①返… II. ①祁…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94249 号

返回的步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方法与论域

祁涛著

责任编辑/陈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23 千

202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ISBN 978-7-309-15365-1/A·47

定价: 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序

吴晓明 邹诗鹏 王金林

近些年来，我们与国内外的一些同仁一起，致力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终结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实质性地开启现代思想变革，进而全面影响现代世界并开创现代新型社会科学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视域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涉和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视域的研究被长时间地延宕了，而其中的很多部分还停滞在粗疏草率的理解中。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其实质是从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向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概要地确定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这三个来源，正是欧洲近代启蒙传统在三个主要欧洲民族中的思想或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超越三大启蒙传统的突破口，则是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之时，正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巅峰。英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成熟并与保守主义相关联，法国的自由主义成为异质于保守主义的激进思潮，至于德国则刚刚形成其独特的自由主义思潮。青年马克思从自由主义经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当时欧洲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理论高度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与光大者。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潜存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很多思想，其“互文”结构往往需要回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如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康德、费希特因素，黑格尔的法哲学、社会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辩证法等对马克思的影响，等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是要将马克思还原为德国古典哲学。在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从问

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都从属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脉络，即世界历史的“德国站”是如何展开的，马克思的努力又在于如何超越这一“德国站”，从而要求通过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规划世界史。就此而言，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真正理解和穿透德国古典哲学。

然而，从思想史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哲学的方面，而应当如马克思学说本身那样，包含应有的学科丰富性。其中尤应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为重点，正是这个领域包含着思想史上的丰富内容。

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反过来又激起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的变革及其回应，其结果是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借民族主义的全面兴起——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随后展开的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联手应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曾经对抗的社会政治思潮，逐渐协调起来，并于19世纪70年代形成“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至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更是强调与新保守主义的同一，以抗衡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和保守主义的回潮相伴随的，则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其基调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再度复兴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其学科典范即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打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但是，19世纪50年代前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开始重建并重释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证主义传统，接下来便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其中，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及深受实证主义传统影响的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的社会学，直接开创了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社会科学。马克思、迪尔凯姆与马克斯·韦伯，虽然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创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定位方面却有着巨大差别。

在现代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高度关

注。在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来自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学术传统的尤多，诸如曼海姆、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列奥·施特劳斯、熊彼特、波普、阿隆、萨特、阿伦特、福柯、鲍德里亚、福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史。他们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现代性世界展开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个必经的阶段，从而“反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当然有必要重视来自外部的批判。但现在的情形却呈现出“一边倒”：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基于思想史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实质上否定性的研究，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史层面对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及误读，实质上是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立场为前提的。因此，的确不能把由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设定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论题，当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现成课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存在论层面的论证与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及其思想史层面的拓展及开掘，乃是内在相关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反思，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展开的自我批判。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拒斥或撇开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而在于在参考、借鉴且批判这些资源的前提下，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进而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水平和质量。

应当承认，相比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历史，相比于目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理论以及现实研究，相比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是不足且滞后的。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也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内史”研究，缺乏思想史研究应有的开放性与比较视野。然而，一门基于某种政治思想理论的学说或学科，必须具备明确的思想史研究或历史分析的自觉意识及其规范基础。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十分必需，而且大有可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加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漠视与排斥变得越来越明显。以实证主义为学术基础

的现当代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无批判地论证并解释现当代资本主义，晚近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更是只限于资本主义之一维。如果说，从19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止，西方主流学术界还有兴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性的资源，那么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则越来越拒斥而不是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源。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对学术界的宰制，意味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不可能从内部产生批判性资源。

在现代条件下，保守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作为主流社会政治思潮的补充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既承诺了现代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推进了现代性批判，进而使思想向着未来的筹划深入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曾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实现了某种转化，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抗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传统中，实际上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未来向度，并逐渐建构了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是，这个拒绝批判性介入的同质化世界，真的能够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吗？这一度是德里达、罗蒂、乔姆斯基等深感不安的问题，也是福山、奈斯比特等人关注的问题，更是众多激进左翼理论家焦虑而无解的问题。无疑，对这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超越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框架，并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空间中，把马克思主义当年在近现代转型中发挥的巨大思想资源，再次释放出来。如是，则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不缺乏，反而更具有思想史研究的广阔空间与优势。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着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天独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这一被标举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其新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形成的积极成果，也是一条有希望洞穿全球资本主义困境，因而异质于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并在未来的人类文明格局中有更大责任及作为的道路。对于这一已然扎根于并直接推进当代中国历史性实践的道路，显然需要、也值得展开思想史层面的广

泛研究：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诸多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对话及其历史效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当代转化的内在关系，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逻辑的重述，中国道路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现当代变革，等等，都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史课题。

我们把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解为一项任务。这一视域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当有待于来者辛勤而富于洞见的发掘与开拓。本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与时俱进，并因此显示其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哲学与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如若以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担当，来从事思想史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一研究领域将很快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目录

前言	1
一、作为整体的政治哲学	3
二、反对“连贯性神话”的思想史研究	8
三、思想史研究的“流转义”	11
四、研究的结构与目标	14
第一章 马克思政治思想研究的若干方法	21
第一节 “返回的步伐”：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 政治思想的传统?	23
一、思想史中的前见与诠释学处境	23
二、“返回的步伐”：尚未被思的事物与思的任务	27
三、效果历史的诠释学原则	34
第二节 “理论迂回”：一种阿尔都塞式的重构	40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研究	40
二、阿尔都塞的“迂回阅读”	43
三、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49
第三节 “视差之见”：诠释活动的主体性与话语 空间	54
一、诠释活动的主体性与话语空间	54
二、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视差现象	59
三、诠释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双重任务”	63

第二章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近代政治哲学渊源·····	67
第一节 建立社会：现代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尝试·····	70
一、为什么要谈论自然状态？·····	70
二、“自然-人为”的二元结构与承认关系的转化·····	74
三、利维坦的影响及其困境·····	79
第二节 社会与市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市民社会 问题·····	82
一、市民社会问题的洛克传统·····	82
二、市民社会的抽象机制及其自主性矛盾·····	88
第三节 规范性政治的尝试——近代政治形而上学的 完成与危机·····	94
一、私人与公民的分裂：卢梭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	94
二、“需要的体系”：市民社会的抽象性与个人主义 前提的颠覆·····	100
三、规范性政治的衰落与危机·····	108
第三章 批判与识别：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开启·····	115
第一节 政治批判的诞生背景·····	117
一、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一：政治哲学 与形而上学的统一·····	117
二、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二：政治哲学 与神学政治的理论牵连·····	120
三、马克思介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三：政治哲学 与德国政治的时间错位·····	124
第二节 “副本批判”——政治批判视域下的视域 转换·····	128
一、视差与“消灭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128
二、人的分裂问题：马克思哲学与卢梭哲学的 对话·····	133
三、政治异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现象 描述·····	140

第三节 马克思国家批判的双重内容	146
一、马克思的国家批判之一：关于政治国家结构及其运动原则的批判	146
二、马克思的国家批判之二：关于官僚政治的批判	151
第四章 马克思政治思想对阶级社会的确认与理解	157
第一节 阶级社会的哲学基础	158
一、阶级社会理论之前的两种理解社会的路径	158
二、阶级社会理论的两个理论准备步骤	164
第二节 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机制	170
一、抽象社会的哲学存在论讨论	170
二、劳动含义中的政治思想：从劳动到抽象劳动	175
第三节 异化、社会交往与阶级斗争	181
一、异化问题与近代表现主义的兴起	181
二、社会交往与阶级斗争问题	187
第五章 结构与情势：《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案例	193
第一节 历史哲学视角下的政治分析	195
一、历史的悲喜剧	195
二、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差异	198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时间分析	202
第二节 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	205
一、两种社会历史时间	205
二、阶级分析背后的“深层历史”	207
三、情势的历史与“活的历史”	211

第三节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国家 问题	216
一、关于行政权与立法权的斗争	217
二、国家机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221
三、政党与代表制断裂问题	225
 结语：种子的命运	229
 后记	235

前言

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触及一部书的无限性问题。在这个故事里，一本流传到后世的书被比喻成一座迷宫，故事的情节与结局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遭遇会带来不同的结局。这部小说就像一座迷宫，人们在迷宫里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引向了迷宫里的不同路线。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出发，一次次地走入迷宫，在迷宫的交叉小径中与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相遇。

一部伟大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是由于它的经典性，由于它值得世代地反复阅读，以传递它的真理，而且是由于伟大作品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品质——作者在作品内部预留了解读空间，它欢迎读者一次次进入作品的迷宫，让原本固定的东西被松动，其他的可能性被激活，从而再度生动起来。利用伟大作品的这种品质，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与魅力所在。它不仅要恢复思想的原貌，更要让伟大作品一次次地复活。

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作品并不存在解读的唯一性，伟大作品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也不能有标准答案。任何有唯一标准答案的作品，都关闭了诠释者的能动性，换句话说，诠释者在这样的文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作者完全垄断了作品，他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也在消灭着作品，一旦他停止写作，作品就永远地停留在单一的思想空间之中了。

萨义德在解释柯勒律治的诗歌书写时，特别提示了“伟大的诗歌是它自身的连绵的时空，兼并了其他书写”^①。伟大的思想作品也是如此，它预留给后世一个巨大的迷宫，让后来诠释者的作品回应着自己，并将其吸纳为自己所开创的传统。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极为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层面的数次转向与新的开创，更表现为在现实运动层面开拓了马克思在19世纪所无法企及的领域。没有一个学派或者主义，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教条化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决，它拒绝将马克思的思想仅仅停留在19世纪

^① 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7页。

的意义上，它要求带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一次次地返回到作品之中。

思想史研究尤为懂得这个道理。简单地说，这表现为一个双重任务。第一个任务是重新回到马克思作品的历史语境之中。一方面，通过马克思作品的视角观察 19 世纪的特定语境、人物、思想，理解马克思作品诞生的历史场域；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所处的 19 世纪的思想、语境、文化与历史出发，反观马克思作品所回应的时代问题的具体所指。第二个任务是重新认定马克思作品的结构是多方向的，它无法被化约为若干抽象的主题，相反，它通向多样的解释可能性。进一步说，诠释者能够将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重新置入马克思的作品中加以组合、比较，开创出马克思思想的新的意蕴，从而跳脱 19 世纪历史语境的严格限制。

一、作为整体的政治哲学

在进一步展开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之前，急需澄清一个更为基础性前提：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研究，存在着何种严格的方法论界限？我们是否可以不加区别地研究它们，从而认定，思想史的任务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同一的？正是在这里，当代的研究者陷入到方法的混乱之中。虽然政治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它姗姗来迟，带着强烈的时髦感，却又恰逢其时地安顿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在当前中国思想界的语境中，政治哲学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哲学意义。

马克思主义向来有一套成熟的政治话语，却鲜有一套成熟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热潮顺理成章地点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缺失”。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学术论题是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理论，这一论题脱胎于西方的两个学术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说服力之后，马克思哲学的学院派研究者希望通过重新诠释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一种规范性的政治理论。第二个背景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转移到社会正义

的问题上，并使之逐渐发展为政治哲学的主流。从罗尔斯的问题域出发，部分左翼学者重新发掘马克思学说中有关政治正义、分配正义等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以补充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缺失，进而积极融入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之中。

事实上，这种学术研究的转向，起源于一种极其寻常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过于重视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政治、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影响^①。当政治哲学作为援引性的资源被引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研究时，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承认，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那么像“政治哲学”，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缺乏相关论述，存在着政治哲学方向上的薄弱。但是，这些研究所“发展”了的“政治哲学”最多是柯林伍德所讲的“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片面地补充了原来片面的哲学，最终获得的绝不可能是彻底的、整全的哲学，依然是落回到另一种片面性之中。然而，柯林伍德的误解中却包含着关于哲学研究的正解，即“事实背后的那些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哲学不做拾遗补缺的补充性研究，它不像当代科学研究那样，去填补已有研究中的空白。黑格尔尤其强调了哲学与一般科学研究的区分：哲学尝试将自身论证为绝对知识意义上的为诸科学奠定基础^②。按照这种标准，政治哲学必然地指向关于政治生活的绝对知识，以及要求在哲学方法上是从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中理解政治生活。

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思想史的任务和政治哲学的任务是不是同一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政治哲学必然在哲学的要素中展开，始终关注哲学概念的绝对优先性。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定是围绕着哲学概念而展开的，这一过程不会因为思想史、经济史或社会史的影响，让政治哲学离开“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滑向有限的知识，并陷落在有限知识的无穷无尽的关联之中。先前提到的那种“政

① 比如柯林伍德如此评价：“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兼有黑格尔的强点和弱点：它的强点在于深入到事实背后的那些基础概念的逻辑结构里去；它的弱点在于选择了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在黑格尔是政治，在马克思是经济），作为其自身在这种意义上是充分合理的。”参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4页。

② 参见海德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治哲学”，完全是在知性层面筛选出所谓政治的内容，“过滤”出一种名为“政治哲学”的学说，使其成为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道德哲学等的另一种部门哲学，其实质是让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遭受了来自外部的知性划分。

知性划分首先带来“异”和“同”的问题。有限的知识之间先须明辨，划清知识之间的界限，以求得知识间的差异，否则有限的知识无法通向精微。在差异之外，有限的知识又要相互比较，看出它们之间共同的地方，这不免需要一些中介，或者需要一些调和。梁漱溟曾经批评过一种调和的思维，这种思维将不同知识间看着相近的地方加以混淆，最终一无所获。讲到底，这是由于没有把思想看成是整体的思想。梁漱溟批评道：“实一家思想都是一个整的东西，他那一句话皆于其整的上面有其意思，离开整系统则失其意味；若剖析零碎则质点固无不同者，如果不是合成整的，则各人面目其何丛见？”^① 梁漱溟的话讲得很重：不是整体的思想根本就称不上是思想。

在政治思想的领域中，知性划分的思维是一种先见的政治意见。在政治哲学的古希腊开端处，政治哲学就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见相区分：关于政治事务的回答应当说出政治的本性，而不是关于政治的现象。应该通过哲学概念来把握政治，因为真正地知晓政治的本性，必须是在真理的层面而非现象界。施特劳斯准确地体会到：“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② 政治意见是各种主观思想的杂烩，个人任意地摘取政治现象的表象，这种思维有一定的反思性，但是完全局限在主观性的限度之内。一旦哲学探究政治的本质，它提出的首要任务正是驱逐个人思想内部的主观性，将政治生活还原到世界整体之中。因此，政治哲学揭示了政治事物的本性是作为整体（the whole）的知识而被获得，唯有哲学才探求普遍知识，才能超越那些片面理解政治的各种意见。

德国观念论继承了古代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论题及其成果，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7页。

② 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译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页。

重新界定了关于政治的真理讨论，这既有政治在生成意义上的根据，也有存在意义上的理由。尤其是发展到谢林、黑格尔哲学的阶段，哲学的方法被严格地圈定在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把握上。这种方法无论是谢林的“体系”（system），还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都意味着探究事物的内容离不开事物在其整体中所受到的规定。对于整体的哲学研究，一定是形而上学。以《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为例，谢林批评对于自由的事实长久地浮于感觉的表面，主张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哲学概念理解自由的本质，因为感觉是绝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真理的。更重要的是，谢林马上指出，概念的深刻性与纯粹性离不开“科学世界观的整体的联系”，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单独被规定，所以它与整体的联系只有通过最终的科学完满才会得到证实”^①。毫无疑问，自近代政治哲学以来，自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概念。但无论是研究自由概念的价值，还是探讨自由概念的效用，都仅仅回答了自由概念的必要性，依然无涉自由概念的真理性的。谢林所谓“科学世界观的整体的联系”，不能望文生义地想象为自由与其他概念间的普遍联系，他恰恰是在自由概念真正的重要性上做了说明：自由概念的真理性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被规定的本原，以至于借助这个本原我们足以认识其他的事物。这就意味着，自由概念的重要性完全不在于它是必须被谈论的，而是它本原性地被规定在体系的整体性之中。海德格尔专门评价了这一点：“在体系之整体中确定该概念之处所，就是说显示出，自由和人类的自由存在是如何与存在者整体并肩而立的，并且显示出，它们是如何自行嵌入到存在者整体中的。”^②

黑格尔哲学更加重视哲学的体系性。现在很多研究把黑格尔的法哲学分离为独立的政治哲学，对此，黑格尔本人绝对不会同意。黑格尔宣称，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哲学。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不仅仅在法哲学的内部属于伦理法的范围，这些内容同样隶属于精神哲学，后者与逻辑学、自然哲学一道共同组成黑格尔哲学的完整体系。

①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② 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9页。